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一）

蔡鸿生自选集

蔡鸿生◎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一）

蔡鸿生自选集

蔡鸿生◎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蔡鸿生自选集/蔡鸿生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5. 11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 (系列一)]

ISBN 978 - 7 - 306 - 05435 - 7

I. ①蔡… II. ①蔡… III. ①中外关系—文化交流—文化史—文集
IV. ①K20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5073 号

出 版 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嵇春霞

责任编辑: 熊锡源

封面设计: 曾 斌

版式设计: 曾 斌

责任校对: 林彩云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电话 020 - 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e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17.5 印张 29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0.00 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蔡鸿生

1933年4月生，广东澄海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海交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山大学崧山基金杰出教师。长期从事世界古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唐代蕃胡的历史文化、市舶时代的南海文明、俄罗斯馆与中俄关系、清代广州与西洋文明等，在古代罗马史、中国佛教史等领域颇有建树，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是世界知名的中外关系史学家。1990年，获广东省普通高校教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4年，获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2002年，专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等。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一）

编 委 会

主 任 慎海雄

副主任 蒋 斌 王 晓 李 萍

委 员 林有能 丁晋清 徐 劲

魏安雄 姜 波 嵇春霞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系列一）

出版说明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思想武器，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是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改革开放 30 多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离不开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广东要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目标更需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始终把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省委明确提出，要打造“理论粤军”、建设学术强省，提升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形象和影响力。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调研时强调：“要努力占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高地，扎扎实实抓学术、做学问，坚持独立思考、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提升研究质量，形成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优势学科、学术权威、领军人物和研究团队。”这次出版的“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就是广东打造“理论粤军”、建设学术强省的一项重要工程，是广东社科界领军人物代表性成果的集中展现。

这次入选“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的作者，均为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2011 年 3 月，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启动“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

评选活动。经过严格的评审，于当年7月评选出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16人。他们分别是（以姓氏笔画为序）：李锦全（中山大学）、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陈鸿宇（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张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饶芃子（暨南大学）、姜伯勤（中山大学）、桂诗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莫雷（华南师范大学）、夏书章（中山大学）、黄天骥（中山大学）、黄淑娉（中山大学）、梁桂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蓝海林（华南理工大学）、詹伯慧（暨南大学）、蔡鸿生（中山大学）。这些优秀社会科学家，在评选当年最年长的已92岁、最年轻的只有48岁，可谓三代同堂、师生同榜。他们是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是体现广东文化软实力的学术标杆。为进一步宣传、推介我省优秀社会科学家，充分发挥他们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根据省委宣传部打造“理论粤军”系列工程的工作安排，我们决定编选16位优秀社会科学家的自选集，这便是出版“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的缘起。

本文库自选集编选的原则是：（1）尽量收集作者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专著中的章节尽量少收。（2）书前有作者的“学术自传”或者“个人小传”，叙述学术经历，分享治学经验；书末附“作者主要著述目录”或者“作者主要著述索引”。（3）为尊重历史，所收文章原则上不做修改，尽量保持原貌。（4）每本自选集控制在30万字左右。我们希望，本文库能够让读者比较方便地进入这些岭南大家的思想世界，领略其学术精华，了解其治学方法，感受其思想魅力。

16位优秀社会科学家中，有的年事已高，有的身体欠佳，有的工作繁忙，但他们对编选工作都非常重视。大部分专家亲

自编选，亲自校对；有些即使不能亲自编选的，也对全书做最后的审订。他们认真严谨、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学风，令人肃然起敬。

在编辑出版过程中，除了 16 位优秀社会科学家外，我们还得到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每三年评选一次。“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将按照“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要求，陆续推出每一届优秀社会科学家的自选集，把这些珍贵的思想精华结集出版，使广东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之薪火燃烧得更旺、烛照得更远。我们希望，本文库的出版能为打造“理论粤军”、建设学术强省做出积极的贡献。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文库”编委会
2015 年 11 月

学术自传

◎ 蔡鸿生

我是岭南土著，原籍澄海，1933 年生于汕头市。从小经历社会动荡，缺乏健全的文化基因。1953 年考上中山大学，从此才受到历史学的专业教育。1957 年毕业，留校任教。1985 年晋升教授，并兼任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至 2006 年退休。

经历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读书、教书，也写书，书生气倒沾了一些，专家型则尚未成型，只能算是一名跨世纪的历史学人而已。主要研究领域：俄罗斯馆与中俄关系、唐代蕃胡的历史文化、市舶时代的南海文明、清代广州与西洋文明。此外，还探讨过僧史和尼史。可以说，我所涉足的学术领域，不今不古，非洋非土，其客观的规定性就是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考察不同时期双边互动的历史情景，尤其是两种异质文化从接触到交融的情景。略人所详和详人所略，是我一贯坚持的著述原则。

学问是一个望不到边际的认识领域，有起点而无终点。即使是大师巨子，也不敢宣称自己什么时候到顶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学海无涯”、“学无止境”一类话，作为古代学者的悟道之言，在信息时代依然保持着它的棒喝作用。予生也晚，但与学问结缘却也颇久了。可惜悟性不高，一直未能深入学境的腹地，至今仍然是一个碌碌的“边民”，无任何“前沿”意识可言。像南宋诗人陆放翁那样的敏感：“树杪忽明知月上，竹梢微动觉风生”，我是自愧不如的。倒是清代画家郑板桥的对子：“多读古书开眼界，少管闲事养精神”，反而正中下怀。因此，长期安于在“自留地”上笔耕，不计较丰收还是歉收。按个人治学的习性，惯于进窄门，走小路，找陌生人交朋友。因此，凡所考述，只有拾遗补缺之微意，完全不存在成大器的奢望。古语云：“不贤识小。”对我来说，要紧的是识小，至于贤不贤何妨待人评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沈从文先生这段夫子自道，正合我心，但愿读者知之，谅之，

教之。

早在八十多年前，陈寅恪先生就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语重心长地写道：“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治学之路通向世界，是精神生产克服“小农意识”的必然趋势。安于一隅，不屑知彼或懒于知彼，往往会沦为“乡曲之学”，纵然没有自我陶醉，实则已经掉队了。我在唐代蕃胡研究中，尽管对国际突厥学和粟特学的成果不敢玩忽，但毕竟语言工具贫乏，能弄到手的书刊也寥寥无几，往往徒叹奈何。1996年秋季，应邀访问瑞典隆德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得以利用两校丰富的馆藏，补读了一些过去未读的书，在“知彼”方面略有寸进。但从总体上说，我对有关学术领域的了解，依然挂一漏万。明知不可“闭户造车”，却仍处于“贫血状态”，这是无可辩解的。季羡林教授生前为拙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作序时，使我又一次感受到来自前辈的督责：“居今日而谈学问，必须中西兼通，古今融会，始能有所创获，有所前进。坐井观天，固步自封，是绝对不行的。任何学问，现在几乎都是世界性的。必须随时掌握最新动态，才真正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稍一疏忽，即将落伍。”金玉之言，落地有声。时代的步伐已迈入21世纪，我虽然是一个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人，仍然是希望“有所前进”的。

目录

学术自传 / 1

“商队茶”考释 / 1

《朔方备乘》俄罗斯馆纪事补正 / 25

清朝使臣与俄国汉学家的交往 / 39

俄罗斯馆与《资本论》中的王茂荫 / 55

突厥法初探 / 59

突厥奉佛史事辨析 / 81

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说 / 98

唐代九姓胡崇“七”礼俗及其源流考辨 / 121

市舶时代广府的新事物 / 130

宋代广州蕃长辛押陀罗事迹 / 142

俄美公司与广州口岸 / 158

清代广州的荷兰馆 / 181

王文诰荷兰国贡使纪事诗释证 / 196

清代广州行商的西洋观 / 208

清初岭南僧临终偈分析 / 218

岭南尼庵的女性遗民 / 232

狮在华夏 / 242

哈巴狗源流 / 256

附录 蔡鸿生主要著述目录 / 265

“商队茶”考释

清代对欧洲的茶叶贸易，分南北两路：南方由广州经海路输入西欧，北方由恰克图经陆路贩运俄国。欧洲人对“茶叶”的称谓，也因闽南方言与北方官话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借词：

英人呼茶曰“替”，法人呼茶曰“代”，俄人呼茶曰“柴”。茶、柴二音相近，以其贩走北路故也。^①

北路茶叶贩运的基本形式是商队，故被称为“商队茶”。在近代欧洲茶叶市场上，俄国的“商队茶”具有比海运国家更强的竞争能力。关于这一点，米勒在《西伯利亚的征服和早期俄中交往、战争和商业史》中已经指出：“输入俄国的茶叶在味道上和品质上，比从广州运到欧洲的茶叶好多了。这两种茶叶也许原来一样的好；但是，据说经海洋运输大大损害了茶叶的香味。”魏源《海国图志》卷八三也作过如下解释：“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叶反佳，非如海船经过南海暑热致茶味亦减。”

“商队茶”的独特性及其在欧洲商业竞争中的意义，早已引起马克思的注意。他除了指出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其中大部分是上等货，即在大陆消费者中间享有盛誉的所谓商队茶，不同于由海上进口的次等货”；同时，还特别强调在对华关系中，“俄国人自己独享内地陆路贸易，成了他们不可能参加海上贸易的一种补偿”^②。难怪早在1840年，俄国就有人欢呼“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③。对陆路贸易的垄断地位，不仅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形成俄国的商业优势，直接影响到后来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划分，而且，清代中俄关系的某些重大政治事件，也可从中找到经济的动因。例如，沙皇政府为什么对太平天国进行武装干涉，它致理

① 张德彝：《四述奇》卷一四，“光绪五年八月初六日”条。

② 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0页。

③ 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36页。

藩院的咨文说得一清二楚：“因贵国内乱，以致我恰克图买卖连年壅滞，敝国欲迅速代平叛乱。”（《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六）另一方面，“商队茶”贸易也与整个国际形势息息相关。例如1812年的拿破仑战争，引起俄国社会生活的动荡，使华茶运俄量急剧下降：1811年，经恰克图运俄的白毫茶46405普特，1812年仅为24729普特，几乎缩减了一半。^①可见，通过恰克图的“商队茶”贸易，其重要性是不应该低估的。

事实上，到了近代，恰克图贸易基本上就是茶叶贸易。1839至1845年间，茶叶已占恰克图全部出口商品的91%。^②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那条在18、19世纪联结中、俄两大帝国的“茶叶之路”，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说，海运茶因与通商口岸的开放有关而引人注目，那么，“商队茶”则由于内陆转贩而被忽略了。从现存的清代文献看，无论是官方文书，还是私人著述，都缺乏对“商队茶”的系统记载，令人难以进行全面的钩索综合。这里暂且从考释若干重要的史料入手，借以探索“商队茶”兴起的背景、华商茶帮的盛衰，以及“俄茶倒灌”和俄罗斯馆与“商队茶”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虽属一鳞半爪，却是全面考察中俄两国商务与外交的相互关系所不可缺少的研究。

一、茶叶入俄之始

俄国人并不是茶叶贸易的先驱。早在“商队茶”兴起之前，西欧的海运国家已经从中国南方贩运茶叶了。据薛福成《出使英德义比日记》“光绪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条说：

中国茶之到欧洲，始于明万历四十年，荷兰之东印度公司携带少许，以供玩好。国朝顺治八年，荷兰始载茶至欧洲发售。越十年，茶市益行，英京始立茶税之律。当时甚为珍贵，馈送王公不过一二磅而已。又越三十年，茶务益盛，英京始多收茶叶之税。^③

① 科尔沙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喀山，1857年俄文版，第110页。

② 霍赫洛夫：《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第93页。

③ 《庸庵全集》第八册。并参见施莱格尔：《茶叶初传荷兰考》，《通报》，1900年，第468—472页。

与上述情况相仿,“商队茶”在其形成过程中也经历了从礼品到商品的转变,但年代比海运茶略迟。在荷兰人首次携带茶叶入欧后四年,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哥萨克什长彼得罗夫才在卡尔梅克汗廷初尝茶味,并对这种“无以名状的叶子”表示惊异。至崇祯十三年(1640),俄使瓦西里·斯达尔科夫从卡尔梅克汗廷返国,带回茶叶200袋(每袋重3俄磅,1俄磅合409.51克),奉献沙皇,是为华茶入俄之始。^①

清朝初年,来华的俄国使臣继续将茶叶作为礼品带回俄国。康熙十四年(1675),俄使尼果赖在觐见后接受“御赐”茶叶4匣,以及托他转送沙皇的茶叶8匣。^②除这种官方交往的礼品茶外,作为商品的茶叶也开始在俄境出售。17世纪后期,托波尔斯克市场上已有少量茶叶供应。^③1674年(康熙十三年),莫斯科也有商店经营茶叶,零售价每磅30戈比,消费者为富裕人家,茶叶进口量还是不大的。^④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订立《尼布楚条约》后,根据该条约关于“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准其交易”的规定,边关贸易日益活跃,华茶经尼布楚入俄的数量也略有增长。如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俄国“客商”加·罗·尼基丁采购的价值32000卢布的中国货,内有茶叶5普特(每普特重16.38千克)7俄磅,每普特按莫斯科市价为20~25卢布。^⑤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以郎古索夫为首的沙俄国家商队到达北京,^⑥此后即隔三年一次,定期前来贩运金银、棉布、丝绸和瓷器,但尚未大笔成交茶叶。1729年至乾隆二十年(1755),俄国停派商队来京贸易,正式开放恰克图互市,茶叶才逐渐变成“买卖城”最大的买卖。据俄方记载,乾隆十五年(1750),经恰克图运俄的砖茶7000普特、白毫茶6000普特。嘉庆十五年(1810),这两类茶已达75000普特,几乎增长六倍了。^⑦

恰克图互市的繁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俄商,以至在1792年(乾隆

① 巴德雷:《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伦敦,1919年英文版,第118页。

② 巴德雷:《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伦敦,1919年英文版,第398页。

③ 维尔科夫:《十七世纪托波尔斯克市场的中国货》,《苏联历史》,1958年第1期,第110页。

④ 科尔沙克:前揭书,第51页。

⑤ 《客商尼基丁在西伯利亚和中国经商记》,载《巴赫鲁申学术著作》第3卷,莫斯科,1955年俄文版,第242页。

⑥ 《故宫俄文史料》,1936年版,第274—275页。

⑦ 斯卡里科夫斯基:《俄国在太平洋的商务》,彼得堡,1883年俄文版,第141页。

五十七年)订立《恰克图市约》时,俄方已正式组成六大商帮:(1)莫斯科帮——经营呢绒、海象皮、海獭及其他俄国货;(2)土拉帮——经营羊羔皮、猫皮和小五金;(3)阿尔扎马斯克、伏洛格达帮——经营芬兰狐皮和北极狐皮;(4)托波尔斯克帮和(5)伊尔库茨克帮——均经营皮革、貂皮、狐皮和毛外套;(6)喀山帮——专营皮革制品。^①这些用毛皮换取茶叶的俄国商帮,开创了“彼以皮来,我以茶往”(《朔方备乘》卷三七)的贸易传统,使“商队茶”不仅在贩运形式上而且在交换内容上,都与海运茶截然不同。

二、“西帮茶商”的贩运活动

在恰克图互市中,俄国商帮的对手是山西商人,即所谓“西帮茶商”。《朔方备乘》卷三七云:

其内地商民至恰克图贸易者,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

山西人“善贾”,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出名。据《北史》卷一五《魏宗室常山王遵传》载:“河东俗多商贾,罕事农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识耒耜。”这种河东古俗,一直保持到清代。《阅微草堂笔记》卷二三云:“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后仍出营利。”清初为内务府办进皮张的“八家商人”,也均籍隶山西。乾隆《万全县志·志余》对此记述颇详:

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王、范永斗(斗,《介休县志》卷九作“年”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定鼎后,承召入都,宴便殿,蒙赐上方服饌。自是每年办进皮张,交内务府广储司。

^① 科尔沙克:前揭书,第94—95页。

山西商人既有悠久的贸易传统，清初又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因此，关内与塞外的商业联系，便长期掌握在他们手中。对“商队茶”的贩运，吸引大批山西商人深入武彝茶区。关于武彝茶区“西商”的财力和风度，在衷干《茶市杂咏》^①中有具体的记述：

清初茶叶均由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至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

张家口是西帮茶商屯栈之地，从福建采买的茶叶都在这里接运，经“买卖路”转贩“买卖城”（恰克图）。据咸丰十年九月察哈尔都统庆昀奏：

由口赴恰道路，除军台之外，商贾之路有三，分东西中：东路自乌兰坝入察哈尔正蓝旗界，经内札萨克西林郭勒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尔贝子等旗游牧，入外萨克车臣汗部落之阿海公旗游牧，经达里冈爱东界，入车臣汗部落之贝勒等旗游牧，达于库伦，由库伦方达恰克图，此东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坝、河洛坝，经四子部落沙拉木楞图什业图汗旗，至三音诺彦旗分为两路，其一西达里雅素台科布多，其一东达库伦，由库伦达恰克图，此西一路也。中路自大境门外西沟之僧济图坝，经大红沟、黑白城子镶黄旗牛群大马群、镶黄旗羊群各游牧，入右翼苏呢特王旗，经图什业图汗车臣汗部落之贝勒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鲁伦河达库伦，方达恰克图，此中一路也。

自张家口至恰克图，计程约4300余里，地旷人稀，风餐露宿，且行且牧，三路均极艰难。因此，西帮茶商不得不结队而行，其组织形式大体如下：

晋中行商，运货来往关外诸地，虑有盗，往往结为车帮，此即泰

^①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304页。

西之商队也。每帮多者百余辆，其车略似大古鲁车（达呼利之车名），轮差小，一车约可载重五百斤，驾一牛，一御者可御十余车，日入而驾，夜半而止，白昼牧牛，必求有水之地而露宿焉。以此无定程，日率以行三四十里为常。每帮车，必挈犬数头，行则系诸车中，止宿则列车为两行，成椭圆形，以为营卫。御者聚帐棚中，镖师数人，更番巡逻。入寝，则犬代之，谓之卫犬。^①

山西茶帮以牛车为家，俗名“一间房”。道光年间遣戍军台的诗人吴嘉宾，曾赋《塞上新乐府八首》，其中《一间房》诗自注云：“张家口牛车赴恰图（恰克图）商贾，长年往来不息，以车为家，名一间房。”

不过，牛车并非唯一的运输工具，到了冬季，塞外草衰，骆驼似乎更适于远行。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三，记骆驼队自库伦抵恰克图的情景如下：

客货俱载以骆驼，俄罗斯人每以千里镜窥之，见若干骆驼，即知所载若干物，商未至前四五日已了然，盖其镜已见于三四百里外矣。

因此，俄国驻恰克图的商务专员对华商货物的记载，也采用骆驼和大车两种计算单位。如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运抵买卖城的中国货为2500驼和1420车；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为3450驼和1420车。道光年间的贸易额继续增长，1829年（道光九年）已达9670驼和2705车了。^②

显然，鸦片战争前“西帮”贩茶数量已经相当可观，据《海国图志》卷八一云：

俄罗斯茶在北边蒙古地方买去。在一千八百三十年买去五十六万三千四百四十棒（磅），在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买去六百四十六万一千

① 《清稗类钞》第17册，第73页。并参见〔日〕寺田隆信著，张正明等译：《山西商人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313页。

② 霍赫洛夫：前揭书，第96—97页。并参见庞义才、柴绍森：《论清代山西驼帮的对俄贸易》，《晋阳学刊》，1983年第4期，第12—21页。